制图：王涛
版式策划：纪安静
责任编辑：高莉
执行主编：哈丹宝力格

2026年
11月27日
星期五

内蒙古日报

文物说

【自白】

寒刃藏风忆当年

□本报记者　高莉

我是一支青铜矛，诞生于秦王政三年，即公元前244年。那时，群雄逐鹿，秦国蓄力拓土，经略北方边塞。我在熊熊炉火中淬炼得坚硬挺拔，背负着秦王的制度，带着兵器特有的锋芒，奔赴黄河东岸，守卫着这方山河。

秦王嬴政以制度立军，以匠心铸兵。大家细看我的身姿，器型规整修长、比例端庄，矛身中脊隆起、线条挺拔利落，刃面凝霜藏锐、沉稳有力，是秦国兵器标准化、规范化制作的典型代表。

我身体上最珍贵的印记是镌刻清晰的铭文“三年相邦吕不韦造……”不仅清晰记载着我的诞生年月，更藏着秦国缜密周全的军工监造体系。

秦王造器，权责分明、层层可溯。上至总揽朝政、统筹百工的相邦吕不韦，总领天下兵器督造要务；中至地方郡守、各级工官，层层监管、层层核验；下至潜心冶铸的无名工匠，精工细作、恪尽职守。从朝堂督造到工坊实操，每一道工序都严谨规范，每一件器物均有据可查。

我诞生后，辞别中原，远赴北方边塞重镇。这里依山枕河、襟带黄河古渡，扼守南北要道，是秦王经略河南地、管控河套疆域的前沿屏障。悠悠岁月里，我伫立城头，迎朝阳、伴落日，目睹秦军驻防戍边、修缮河塞、固守疆土。

我不仅是戍边御敌的利刃，更是北方各民族交融共生的见证者。漫长岁月中，我见过中原戍卒屯田垦荒、安家落户，播撒农耕文化；见过北方各游牧部族频繁往来、互通有无。金戈铁马之时，我护山河安稳、御边境之乱；四海安定之时，我静静守望这片土地，亲历农牧相依互通的融融气象，见证了秦朝“以河为固、缮河上塞”的治边智慧。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王朝更迭、烽烟散尽，我褪去杀伐戾气，深埋黄土两千余载，历经风雨侵蚀、岁月打磨，矛锋虽微微残损、铜身也覆满斑驳锈迹，但始终保留着秦时兵器的铮铮风骨。

破土重光，我不再是沙场征战的兵器，一跃成为镌刻岁月、承载文化的千年信物。身体上的铭文藏着秦时的制度，满身风霜载着厚重的历史，我既是秦朝军工体系、边疆治理的鲜活物证，也是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碑铭。

【出圈】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一级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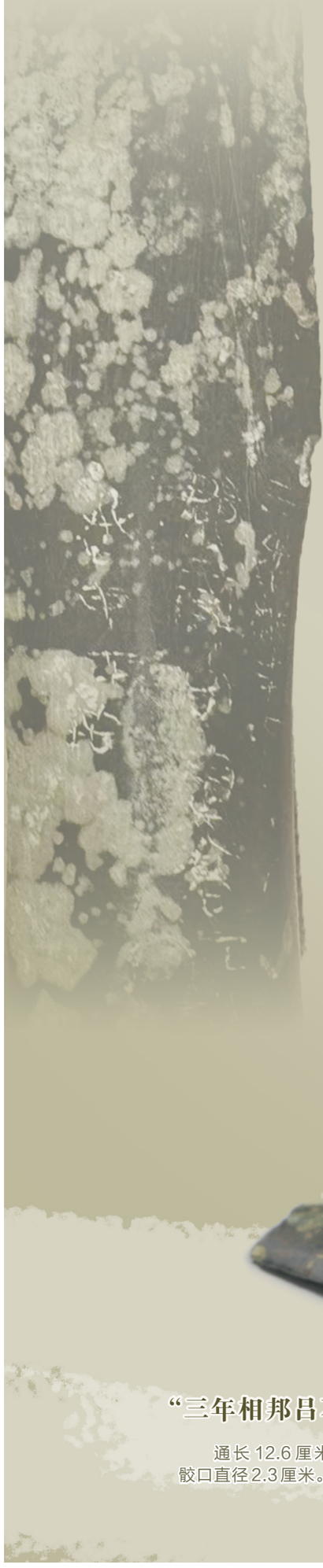
『三年相邦吕不韦』青铜矛出土于清水河县喇嘛湾镇拐子上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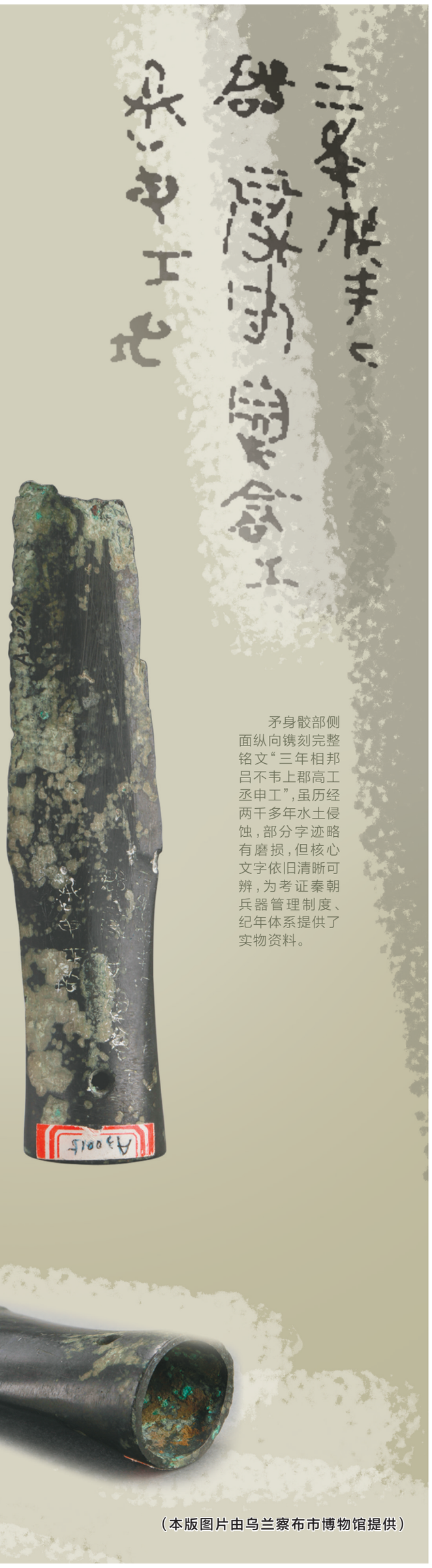
精彩讲解扫码阅读

秦矛勒铭成边陲

□本报记者　高莉　通讯员　阿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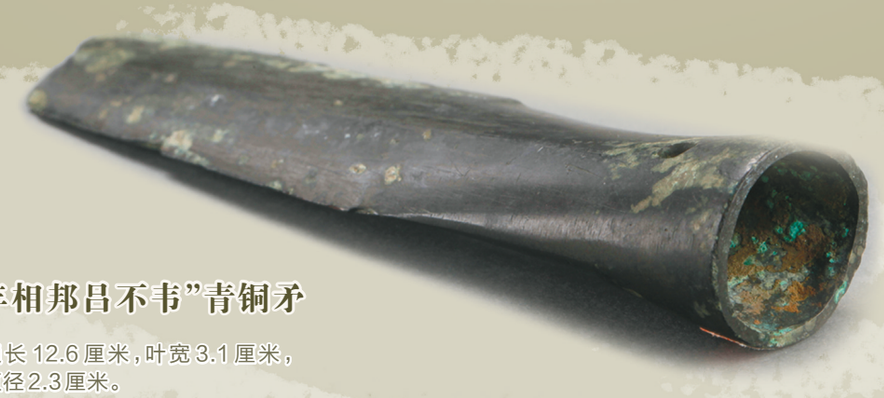
矛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兵器。完整的矛由矛头、桪和镦三部分组成。我们通常所称的矛是指矛头部分，由身、骹两部分组成。





“三年相邦吕不韦”青铜矛整体为标准的叶形矛身，断面为规整菱形，稳定性极强；矛的骹部为直筒造型，呈椭圆开口，内部中空一直延伸至矛锋端部，便于稳固安装长柄。骹部两侧对称开设穿孔，用于绳索捆绑固定矛柄。

矛身骹部侧面纵向镌刻完整铭文“三年相邦吕不韦上郡高工丞申工”，虽历经两千多年水土侵蚀，部分字迹略有磨损，但核心文字依旧清晰可辨，为考证秦朝兵器管理制度、纪年体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年相邦吕不韦”青铜矛

通长12.6厘米，叶宽3.1厘米，骹口直径2.3厘米。

（本版图片由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提供）

拐子上古城位于清水河县喇嘛湾镇拐子上村东侧山梁的西坡上，自古便是地处黄河沿岸的北方边塞要地。1983年9月的一天，村民修路时在古城内挖到10件青铜兵器，包括上面铸有“相邦吕不韦三年”“相邦吕不韦四年”等铭文的戈、矛。彼时，清水河县隶属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这些宝贝便由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今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收藏。

喇嘛湾镇所在区域在秦汉时期是中原王朝经略北方的关键属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在今托克托县城北古城置云中郡，今喇嘛湾镇缘胡山东南、黄河东岸拐上村东山坡处置桢陵县。《汉书·地理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地理学著作，也是第一部正史地理志，其中有“云中郡，秦置……县十一，桢陵，莽曰桢陆”的记载。结合《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并州·朔方刺史部》所载、所标，缘胡山正是喇嘛湾镇凤凰山诸山。

拐子上古城出土的这批青铜兵器中，铸有“三年相邦吕不韦”等铭文的青铜矛为后人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阿音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这只青铜矛：“通长12.6厘米，叶宽3.1厘米，骹（qiāo）口直径2.3厘米，是典型的秦朝制式短柄青铜矛。器物整体呈现标准的叶形矛身，断面为规整菱形，稳定性极强；矛的骹部为直筒造型，呈椭圆开口，内部中空一直延伸至矛锋端部，便于稳固安装长柄。骹部两侧对称开设穿孔，用于绳索捆绑固定矛柄。尤为珍贵的是，矛身骹部侧面纵向镌刻完整铭文‘三年相邦吕不韦上郡高工丞申工’，虽历经两千多年水土侵蚀，部分字迹略有磨损，但核心文字依旧清晰可辨，为考证秦朝兵器管理制度、纪年体系提供了实物资料。”

“相邦”为中国古代官职名称，百官之首，是辅佐君王治理国家政务的最高级别大臣，起源于春秋，正式设立于战国时期。吕不韦是秦朝著名的相邦，帮助秦始皇的父亲成为秦国国君即秦庄襄王后他担任丞相，秦始皇继位，尊吕不韦为相邦。

阿音详细解释了铜矛上“三年相邦吕不韦上郡高工丞申工”铭文的意思。“三年相邦吕不韦”，是说这件青铜矛于秦王嬴政三年即公元前244年由相邦吕不韦督造。“韦”下应该还有“造”“上”二字，应该是磨损缺失了，它们的完整表述意思是督造者吕不韦。“上”与“郡”相连，即上郡，辖境在今陕西省北部和鄂尔多斯市南部。“高工”，是高奴工师的简称，高奴是秦朝设置的上郡属县，为秦国重要的兵器制造地点。“工”指工师，指高奴铸造兵器的工官。“丞”是制造兵器的具体管理者，工师的下属官职，“申”是丞的名字。“工”是兵器的直接制造者。

矛是商周时期最主要的兵器。完整的矛由矛头、桪（bì）和镦（duì）三部分组成。我们通常所称的矛是指矛头部分，由身、骹两部分组成，一般为铜质或铁质。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先民就已经发明和使用了矛，将以石、骨制成的矛头绑缚在长木柄上，既可当作生产工具，也可作为武器。进入青铜时代后，金属质矛头取代了石矛头和骨矛头，被大量应用于战争，成为青铜时代重要的兵器类别，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兵器的优劣决定战争胜败，《左传·成公十三年》里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以团结互助、尚武精神著称的秦国战歌《诗经·秦风·无衣》里，有激昂的“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诗句。秦朝时期的青铜兵器令人瞩目的有两点：一是兵器制作的标准化，二是“物勒工铭”制度。秦简《工律》要求：“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意思是对相同型号的兵器，要求各方面的数据必须相等，这是对产品标准化的法律要求，护航批量生产的兵器质量。

阿音介绍，通过对比拐子上古城出土的三件青铜矛形制，可以领略到秦兵器制作工艺的高度标准化，从青铜矛上刻的铭文中，能清楚看到“勒铭制度”的发展。

勒铭制度即“物勒工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礼记·月令》中说“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意思是器物上要刻工匠的名字，为的是验证其是否诚实尽职，一旦产品出了问题，必须依法追究，追到底为止。

该制度在秦朝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在秦简《工律》中有明确规定。汉承秦制，制度实施日臻完备，深入到官营手工业的各个方面。唐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制度，将其与工匠的培养考核结合起来。明清时期，政府对官营手工业的管理更加严格，勒铭制度也更规范、具体，最突出的是在工程材料上都要层层勒铭，南京明城墙即为典型代表。

拐子上古城出土的秦朝青铜矛，上面勒铭详细记录了它们的监造部门、官员、工匠名字及制造年份。秦人在兵器上的勒铭制度始于秦孝公，当时刻辞只有督造者的名字。从秦孝公之子秦惠文王嬴驷开始，到嬴驷的儿子秦昭襄王嬴稷，这一时期形成勒铭制度的四级监造制，刻辞中不仅有监造者，还逐渐有了主造者、具体指导管理者和实际制造者的信息。到秦始皇时期，统一了中央督造的勒铭，分为四级：相邦、寺工（或少府工室、属邦工室、诏吏）、丞、工。

文中的青铜矛勒铭不仅反映出罕见的相邦、上郡、高奴、丞申、工匠五级督造全貌，还为我们清晰还原了当时秦国在北方的军备生产、监管、驻防等流程，不仅直观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超前的标准化生产理念、严苛的层级追责制度，更实证了秦朝对北部边塞地区的管理与开发。这件跨越两千余年的青铜兵器，是研究战国末期至秦朝时期军工文明、官营手工业制度方面的珍贵文物。

【观点】

戎器镌痕证千秋

□顾佩

历史浩荡远去，岁月沉淀恢宏。当我们凝视这件铸有“三年相邦吕不韦”等铭文的青铜矛时，动容的不仅是炉火淬炼的器型与千年不泯的锋芒，更有对这些斑驳铭文的钦佩。这些镌刻于青铜之上的印记，忠实地记录着当时的国家治理、社会风貌、军备制度与人物史实，为后世考证古史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史料。

青铜铭痕载岁月，“三年相邦吕不韦”青铜矛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仅镌刻了嬴政、吕不韦等搅动时代格局的风云人物，也记录了秦朝完善成熟的军工监造体系，让世人得以窥见彼时精细的军备管理制度。铭文清晰厘清了秦国造器权责层级，上至总领朝政的相邦，下至地方郡守、基层吏员，直至亲手铸器的工匠，层层溯源、权责分明。这一完备的监造体系，彰显了秦朝标准化、制度化的手工业生产水准，也让工匠的匠心与身影跨越两千余年时光仍被历史铭记。

与此同时，诸多青铜兵器铭文留存的古地名、地域标识，价值弥足珍贵。这些地理记载，既与传世史料相互印证、佐证史实，又能填补古籍记载的疏漏与缺阙，为后人考证历史搭建起文字与实物互证的桥梁。

戎器藏史证千秋。拐子上古城的历史身世，至今仍留存诸多未解谜题，岁月尘封了古城的繁华过往，却未曾湮灭青铜兵器承载的岁月记忆。展柜中的青铜矛幽幽青芒流转，历经两千余年岁月侵蚀，依旧留存着百战磨砺的沧桑痕迹。虽然青铜矛的脊槽已褪去锋芒，甚至矛锋还略有残损，但每一处磨损、每一寸斑驳，都是曾经金戈铁马、烽烟战火的见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年相邦吕不韦”青铜矛的精工铸造与铭文镌刻，蕴藏着秦朝的制度，承载着岁月的沧桑，见证着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磅礴脉络。

（作者系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史话】

云中古塞枕黄河

黄河于此自北向南奔涌流淌，东岸群山叠峙、地势雄峻，西岸高原坦荡、视野开阔，这便是拐子上古城坐拥的地理位置。古城对岸，河谷溪流汇集成河，岸畔平缓，天然形成优良古渡口，自古便是商旅通行、南北往来的咽喉要道。

古城整体呈不规则“彐”字形，现存东、南、北三面夯土城墙，地势东高西低，西侧无人工墙体，巧妙依托黄河天堑为天然屏障，是古人因地制宜、据险筑塞的智慧典范。

经考古考证与史料佐证，学界主流认为此处为秦汉桢陵县故城，古称“桢陆”“箕陵”，隶属秦汉云中郡，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镇守北部边陲、管控河套平原的核心边塞重镇。古城不筑西墙的独特形制，与《史记·匈奴传》《汉书·高祖纪》所载“以河为固”“缮河上塞”的边疆防御体系高度契合，印证了秦汉王朝依托黄河天险构建边塞防线的治边策略。

古城内出土秦朝制式官造兵器“三年相邦吕不韦”青铜矛，证明早在秦统一六国之前，秦国正规驻军已驻守黄河东岸，将军事管控力量深入河套腹地，这里是秦国经略北方、镇守边疆的前沿要塞。

秦置桢陵县，隶属云中郡，是秦王朝北部边塞郡县体系的一环。汉承秦制，延续桢陵县建制，隶属云中郡，后更名“桢陆”，东汉改称“箕陵县”。两汉时期，朝廷在此推行移民屯田、戍边守土政策，修缮塞防、管控渡口、安定边地，使这座边城兼具军事防御、行政管辖与商贸流通多重功能。作为农牧交错核心节点，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在此深度交汇、兼容共生，造就多元交融的人文风貌。东汉之后，桢陵县逐步废弃，古城渐渐淡出正史记载。

（孙圆圆　供稿）